

難忘的歲月



难忘的岁月

辽阳石油化纤公司老干部处编

难 忘 的 岁 月

辽阳石油化纤公司老干部处编

1987年11月 辽化公司印刷厂印刷

(内 部 发 行)

老田去何所我斗历程
是我们所有的榜样

一九八四年七月
王西彦

勘 误

由于校对工作的疏忽，本书《抗战轶事》一文结尾将“唐桂枫整理”五个字遗漏，特此补正。本文第一段小标题中的“浅”字应为“溅”字。

《十四岁的时候》一文的第三、四、五段小标题前，应分别加上“三”、“四”、“五”字样。

目

录

三十八年前·····	梁生光 (1)
抗日烽火中·····	孟庆新 (20)
在敌人的刺刀下·····	王秀生 (31)
难忘的抗大生活·····	郭苏民 (40)
十四岁的时候·····	赵锡久 (47)
抗战轶事·····	杨 升 (55)
在反扫荡中坚持办报·····	张寿恩 (70)
南泥湾时的二三事·····	赵锡久 (81)
路·····	杨宗先 (86)
转战江淮·····	王金山 (104)
土匪赖大肚子覆灭记·····	陈仁凯 (116)
尖刀插进四平城·····	刁廷宪 (122)
粮食·····	栾喜云 (125)
冲上五号阵地·····	仇福林 (130)
校园怒潮·····	谭叔常 (134)
迎接伟大的历史转折·····	李人朴 (138)
残匪被歼记·····	于德路 (143)
雪地伏击·····	田洪儒 (151)
解放团记事·····	张殿臣 (153)
战安阳·····	王启仁 (157)
难忘的时刻·····	周 成 (162)
辽南运铁脱险记·····	郭尚志 (164)

围歼“红眼队”	孙玉生(167)
“李大哥”	陈崇伍(169)
解放北平前后的一段生活	于柏琛(172)
在革命队伍里	耿瑞华(178)
马庸厂长	郑兰田(185)
第十四发子弹	于德路(189)
入朝第一仗	刁廷宪(197)
坚守在天德山下	洛 川(201)
赴朝行军路上	李 杭(205)
在英雄的国土上	陈仁凯(210)
一份加急电报	李世镛(217)
兵站医院	刘录晨(220)
为了朝鲜乡亲	王启仁(223)
战火中的《辽东大众》	孙宝元(227)

后记	(233)
----------	-------

三十八年前

梁生光

为新中国的诞生而战斗的年代，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年代，是翻天覆地大变革的年代。这个时期的中华民族在党的领导下，进行了英勇、殊死地斗争。无数先烈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亿万人民流血流汗作出了重大贡献。他们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使我们永远不能忘怀。为缅怀先烈，继承革命光荣传统，使我们更好地前进，我想通过三十八年前自己亲身经历的一些情况，把党如何教育我成长，如何领导人民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情况下取得革命的胜利，简单叙述一二。

一、参加革命

我的家乡山西省襄陵县，是一个风景秀丽、气候宜人的好地方。同蒲铁路和汾河平行从境内穿过，把全县分成汾西、汾东两部分，是中间平、东西为山区的小盆地地形。主要农作物是小麦和棉花。穷苦百姓勉强维持低水平的温饱。

一九二五年二月，我出生在汾东塔儿山下一个有一百多户人家的上西梁村。那时家里五口人，有父母、祖母和哥哥。靠父亲耕田、母亲纺线织布过日子。在我六岁的时候，便背着妈妈用家织布缝制的小书包上学了。因为父母都没读过书，饱尝没有文化的

苦头，所以，经常鼓励我要好好念书，长大了做个有出息的人。在学校里，老师也常讲爱家乡、爱祖国，讲家乡以外的新鲜事情。我憧憬着美好的未来，学习很用功，成绩也很好。

一九三七年，当我上小学五年级的时候，“七·七”事变爆发了。日本鬼子大举入侵，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太原很快失守。不久，临汾也失守了。日军占领了铁路沿线和临近城镇，不时到各村烧杀抢掠。许多男人被抓走了，田园荒芜，到处是断壁残垣。我们学校也被迫停课了，一切被恐怖笼罩着。我恨透了日本鬼子，盼望着有谁能把他们斩尽杀绝，让乡亲们重新过上安稳日子。

正在人们惶恐不安、走头无路的时候，我党领导的“牺盟会”（抗日牺牲救国同盟会的简称）成立了，组织乡亲们开会，宣传共产党、八路军和“牺盟会”的抗日主张，号召大家团结一心，保家卫国，打败日寇，建立新中国。山西许多地方很快掀起了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特别是青年学生，更是满腔热情地要求奔赴抗日战场。那时，凡是“牺盟会”召开会议，不管在我们村还是在邻村，我都跑去参加。有时他们组织乡亲们开会，我还给跑跑道，招呼招呼人。渐渐地使我懂得了一点革命道理，懂得了只有抗日救国才能不做亡国奴，只有跟着共产党、八路军走，才有生路。我就带着这种朦朦胧胧的革命意识同哥哥一起参加了首批举办的抗日民族革命学校学习。当时，我父母虽然对抗日救国极力赞成，知道共产党、八路军好，但又觉得我们太小，不愿让去。因为哥哥才十五岁，我只有十三岁。为了参加学习，我们便背着父母偷偷走了。

抗日民族革命学校是襄陵的党组织为了教育培养青年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壮大革命力量，于一九三八年六月举办的。教师有乔贯五，是党的负责人之一，也是学校的负责人。还有党员张耀南、夏映舟，他俩都是二十五、六岁的青年。学校设在汾东土地殿村，离我家六、七里路。有三、四十名学员，吃住在那里，我是

最小的一个。因为第一次离开父母，生活又比较艰苦，有时也想家。但由于学校讲授的课程都是有关国家前途、民族存亡的大事，许多道理吸引了我们。其中印象比较深的有这几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日寇侵华暴行，给沦陷区人民带来的灾难，爱国青年要在民族危亡的关头挺身而出，抗日救国，牺牲救国；二是讲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三是讲共产党在领导人民抗战胜利后，还要领导人民建设美好幸福的共产主义社会，并讲了苏联人民在十月革命成功后的幸福生活。老师还给我们讲革命故事，教我们唱革命歌曲。在那里，我们学会了一、二十首歌，还自编自演一些小节目。我们都觉得学校生活很有意思。同学之间、师生之间也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

三个月的抗日民族革命学校生活好象一下子使我懂得了很多事，明白了许多道理。感到要做一个有志青年，就要在民族危亡关头勇于献身，报效祖国；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有光明前途。

毕业后，哥哥被分配参了军，我和一部分同志也分配了工作，将要奔赴新的战场开展工作。

我和哥哥回家向父母告别，经再三说服，讲道理，父母勉强同意哥哥走，但无论如何不让我走。把我要带的两件衣服也藏了起来。父母亲眼含热泪，苦苦挽留，母亲声音颤抖着：“孩子，你这么小就远走，日本人到处杀人放火，叫我们怎放心得下？你哥俩都走了，有个三长两短可怎么办？”父亲又接着说：“你年纪小，身体又不好，跟那些大人一块跑得动吗？你能吃得那些苦吗？”我始终未能说服父母，望着父亲忧伤的面孔，想到就要离开慈祥、多病的母亲，心里也不是滋味，一阵阵酸楚，我流下了眼泪。但又记起老师对我们讲的话，想到国家在受难，百姓在遭殃，有爱国热情的青年应该挺身而出。最后，我还是和哥哥一道按规定时间，趁父母还在梦中，偷偷地带着一个小包袱，包了两件衣服，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离开了家，走向我的工作单位——“抗日动员工作队”，简称“动工队”。

我们一行二、三十人背着行李卷，由张耀南带队，赶往“动工队”所在地。我们走了三十多里路，在敌人两个岗哨之间，要通过同蒲路上敌人的封锁线。当我们过了同蒲路不远，正要过汾河时，被敌人发现了。后面响起了枪声，敌人追来了。汾河横在面前，波浪滚滚。当时正值八月雨季，河面很宽，河水又深，没有桥也没有船。几个会水的先游过去了，扯起事先准备好的绳子拉着我们不会水的人渡河。我年小体弱，攀着绳子吃力地向前挪动着。水没到脖子，喝了几口汤，连呛带累，上气不接下气。待我们急急忙忙刚过河，上了岸回头一看时，鬼子已追到了对岸。我们又跑了二、三十里路，终于到了目的地。这时，才发现我带的一个小包袱不知什么时候丢掉了。

二、在抗日动员工作队

我们工作队由二、三十人组成，大部分是十六、七岁的青年。队长叫郑恩达，指导员叫张耀南，是党派来的干部。我们的任务主要是在汾西一带进行抗日宣传动员工作，写标语、撒传单、开大会，配合演些文艺节目，宣传抗日，动员群众保家卫国。这是一支活跃的小分队。我们每到一个村，就召开群众大会进行宣传。记得有一次，我们在一个村子里开大会，这个村子比较大，全村二百多户人家，男女老少上千人参加了大会。先由工作队负责人讲日寇侵华罪行和抗战形势，然后，我和几个同志演文艺节目，唱“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这支歌，还演自编的小话剧叫《九·一八》。剧情大意是：一个老大娘的丈夫被日寇打死，儿子被抓走，房子也被烧光了。她领着两个幼小的孩子到处流浪，乞讨。由于颠沛流离，受冻挨饿，她的小女儿得了重病，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死在破庙里……剧情十分悲惨。我在剧中扮演那个男孩子，而扮演老大娘的那位女同志的亲人前不久被日本鬼子杀害了。她带着深仇大恨演出，演到悲伤之处，声泪

俱下。在这种气氛感染下，我也忘了是在演剧，情不自禁地跟着哭出声来。由于演得很逼真，台上台下哭成一片。这时，有人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誓死不当亡国奴！”接着，很多人齐声高呼：“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保家卫国！”等口号。当场就有七、八个人报名参军。有的捐钱，有的捐粮。会场上，群众的抗日情绪非常高。不仅因为演出的成功，使我们每个人都有一种说不出的高兴，这种群情激昂的场面也使我们受到了很大鼓舞和教育。

平时，我们还经常到离敌人据点很近的地方进行宣传。有时在黑夜到敌人驻地用石灰水往墙上写大块字，贴标语，撒传单。每次行动一般是三五人一组，两个人放哨，两三个人写，一旦发现情况写上就撒。由于我们行动灵活、敏捷，敌人总是抓不到我们，很是恼火。有几次，由于汉奸告密，敌人出来追我们，在群众的掩护下也都脱险了。

三、西阳景村事件

一九三九年四月间，工作队在县政府和游击大队所在地西阳景村进行休整，准备迎接新的战斗。

西阳景村有县政府和“牺盟会”的同志，加上游击大队的三个中队，共有三、四百人。这里离敌人据点二十多里地，是个小游击根据地。原以为到这里可以睡几宿安稳觉了，不料，到这里的第二天拂晓，枪声就把我们从梦中惊醒。我们已被包围，形势非常危急。由于事先没有觉察，毫无准备，又因三个中队不在一起住，我们也分散住在老乡家里，所以没来得及统一组织撤退。我和几个同志迅速跳下炕，随一部分部队向东突围。敌人火力猛，不断嚎叫着：“缴枪不杀！”眼看着几名同志倒下去了。东边突围不出去，又向西突围。西面的敌人埋伏在高崖上，待我们临近时，密集的子弹向我们射来，子弹从我的耳边擦过，发出“啾

嗽”的声音。我听见又有几个同志到下去了，心里难过极了。经过几次突围，只有一个游击中队在指导员率领下冲出重围，多数人突围没有成功，被迫退回村里，利用院落进行抵抗。当时整个村子里枪声、喊声和孩子们的哭声交织在一起，敌我双方战斗得非常激烈。但终因寡不敌众，鬼子冲进村子里，把躲藏的群众和未暴露身份的工作人员都驱赶出来。我们夹杂在群众中来到了一块空地上，鬼子端着明晃晃的刺刀来回走动着，眼睛盯着群众，人群里鸦雀无声，好象空气都要凝固了。突然，鬼子由汉奸领着，丧心病狂地把凡是怀疑是抗日的工作人员一个个拽出来用刺刀捅死了，把年轻力壮的农民抓出来五花大绑地赶走了。仇恨的烈火在人们的胸膛里燃烧着，不可扼止的愤怒噬食着人们的心。不知谁家的小孩吓的“哇”的一声大哭起来，只见一个鬼子凶神恶煞般窜过去，从母亲的怀里抢过孩子，挑在枪尖上狠狠地摔在地下！那位妇女拼命去救护孩子，被鬼子一脚踢昏过去……。

敌人还在屠杀。一个鬼子走到我的面前，他看了看我，问我身旁的老大娘：“什么的干活？”“我的孩子！”这位老大娘冒着极大的风险毫不犹豫地回答。那鬼子看我又矮又小，信以为真，就走过去了。这时，村外西南方向突然响起枪声，是突围出去的部队和赶来救援的部队一起来增援我们了。当时，在几个院子里坚持战斗的游击战士也冲出来和鬼子拼。日本鬼子受到内外夹击，看形势不妙，夹着尾巴逃跑了。后来知道，这次日伪军来了六、七百人，死伤数十人。我们损失也很大，游击大队长牺牲了，县长受伤被俘，被日军拴到马尾上拖到敌人据点。游击战士和我们工作人员死伤三、四十人，群众被打死打伤的也不少。这就是当时有名的“西阳景村事件”。

敌人在西阳景村制造的暴行，更增加了我们对敌人的仇恨，党组织和“牺盟会”的领导立即召开大会声讨日寇暴行。大家纷纷表决心，坚决抗战到底，夺取最后胜利，为死难者报仇。

我父亲听到西阳景村事件后，不知我是死是活，很是担心，

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便和邻村一位乡亲一块越过敌人封锁线，走了两三天才找到我们驻地，要我跟他回去。经再三劝说，队领导也帮助说服，我父亲流着泪回去了。我留下来，并表示决心：不管遇到任何情况，决不动摇，革命到底。

四、入 党

西阳景村事件后不久，我被调到襄陵县的《前进报》工作。报社地点在襄陵和乡宁交界处的一个三、四户人家的小山庄。名义上是“牺盟会”办的报纸，实际是县委的党报。四开油印，五天到一周出一次报，每期印二、三百份。内容主要是宣传抗战形势和党的政策主张，介绍全国战场情况、本县群众抗日救国运动情况以及抗战英雄事迹，等等。工作人员共有三个人，由原工作队的张耀南同志负责，我和燕永庆负责刻印、分发。报社只有一块钢板，一支钢笔，用的纸是土法抄制的。没有油印机，我们就用一个滚子和一块玻璃板印报。我们没有刻印过，所以开始刻字总是刻坏，也印不清楚，模糊一片。我们便白天黑夜地练，手指疼了，背酸了，活动一下再练。那时候，我们唯一能看到的报纸是《五日时事》，是一一五师办的，内容丰富，用钢笔刻印，正楷字，印得整洁、清楚。报社负责人向我们讲述了《五日时事》报的同志们为了工作需要，隐蔽在一个地下窖洞里，几个月不上来。这种忘我的工作精神，对我们启发教育很大。我们就以他们为榜样，努力克服困难，做好工作。经过一段时间的精心苦练，逐渐提高了技术水平，终于印出了清楚、整洁的报纸。我们看到自己辛勤劳动的成果，无比喜悦。这份报纸，在襄陵县的抗日战争中曾起到了不小作用。

在我们工作之余，张耀南同志就给我们讲党的纲领和党的章程，讲共产主义理想和现阶段主张，以及许多共产党员的英雄业绩，还讲辩证法、《资本论》，讲苏联十月革命和共产主义远

景，等等。我用心听、用心思考，使我的思想更加开扩了，工作也更加勤奋。后来，张耀南又给我们讲共产党员的条件和义务，如何做一名共产党员。一天，张耀南兴奋地告诉我：经党组织研究同意，由他培养我入党，我高兴得不得了。我暗下决心，做为一个有志青年不仅要为抗日救国做贡献，还要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要努力争取做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于是，我更严格要求自己，按照党员的条件去做。一九三九年六月六日，是我终生难忘的一天。这一天，天空是那样晴朗，明媚的阳光照在身上，格外温暖。经张耀南同志介绍，我这个十四岁的孩子，在党的培养教育下，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我们报社所在地的一个窑洞里，举行了庄严的入党仪式。在一面自制的镰刀斧头红旗下面唱国际歌，高举右手向党宣誓。誓词大意是：服从党的组织，执行党的决议，保守党的秘密，一切听从党安排，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接着，介绍人张耀南同志讲话。他说我是本地第一批发展的年龄最小的一个青年党员，是“特批”的。上级党组织还派来一名同志参加入党仪式。他和我谈了话，勉励我继续努力，在斗争中、在艰苦的环境中磨练自己，经受考验，争取更大的进步。我受到很大鼓舞，增添了力量。从此，我把自己的一切都交给了党，包括最宝贵的生命。我决心听从党的召唤，跟着党干一辈子革命。

五、在敌伪包围中坚持斗争

一九三九年，晋东南、晋东北、晋西北都成为我们的强大的根据地。就是在阎锡山统治下的晋西南，我们组织的新军二一二、二一三旅和游击队也已经发展到两三万人。我党和牺盟会的工作人员活跃在山西各地，群众也组织起来了，抗战形势非常好。阎锡山看到人民武装力量不断壮大，感到很害怕，于是，经过秘密策划，便于十二月集中兵力向晋西南、晋西一带的我军和

“牺盟会”组织发动了大规模地进攻，妄图一举消灭我们。这就是阎锡山和蒋介石互相勾结发动的一次反共高潮——有名的“十二月政变”。我军在给阎军以重大打击后，主动地撤出了晋西南，转移到晋东南和晋西北。我们报社撤退时，我正在外出执行任务，待我回来时，同志们都已撤走了。报社同志临走时，嘱咐一位老乡转告我，让我赶快向汾东撤退。这时，阎锡山的军队离这里只有几里地了，我迅速下了山，趁汾东一个集镇赶集的机会，和一位老大爷说明了情况，请他带我通过敌人封锁线。这位老大爷虽然不认识我，可听我一说，他就爽快地答应了。我扮作他的孩子，挑着柿子筐要到集上去卖的样子。到了敌人封锁线，只见日军和伪军正在一个个搜查过往行人。先是全身搜查一遍，再翻翻带的东西，看有无武器之类可疑的东西，遇到什么好吃的顺手拿几个，骂骂咧咧、连推带搽的一副可憎面目。特别是对年轻的男人则搜查得更加仔细。凡是被怀疑是游击队的就截住。搜查我们的时候，伪军先摸摸老大爷的身上，没有发现什么，又翻翻筐，拿走几个柿子，见我是个孩子，草草搜了一下就放我们过去了。我在心里骂着，加快了脚步。走了几里路，我告别了老大爷，到汾东塔儿山下一个村庄找到党组织，开始了新的战斗生活。

襄陵汾东有三、四十个大小不等的村庄，是个方圆不过二、三十里的狭窄地区。这里是抗日游击根据地，有游击大队四、五十人，还有县委、县政府机关和从晋西南撤退来的晋西特委机关的一些干部。这里的环境非常复杂，四周有日伪军和国民党的土匪军踞守，不时袭击我们。日伪军于“十二月政变”后，在我们周围又增加了兵力，增设了据点，活动也更加猖狂。

当时，我是特委机关干事。组织让我刻印、分发油印的《大众抗战报》，一共出了十几期。这在当时敌情十分严重的情况下，大家能看到我们的小报，听到党的声音，了解抗战的形势，对鼓舞军民坚持斗争起了很大作用。由于我年令小，容易掩护，又熟

悉当地情况，组织还给了我另一个特殊任务，让我做通讯联络工作。我们分散在各个村活动。每个村子都是活动点，走到哪吃住在哪，到处都是我们的家。由于有群众的支持和掩护，一般敌人的活动我们都知道，对汉奸的活动我们也能随时掌握，随时都可以想办法除掉他。为破坏敌人铁路交通线，我们和游击队一起破坏铁路路基，把铁轨拆下抬回来。四个人抬一根，一次要跑几十里地。当时我们的武器很缺，我们就把抬回来的铁轨锯成一尺左右的段段，然后加工制成土手枪，一次装一颗子弹，能打二、三百米远。靠这种土造手枪，武装了我们许多干部，这在当时也起了一定作用。

我家所在地——上西梁村，是游击队和工作人员活动的主要地区。这里离日军据点只有七里地。父母亲由于受到党的教育，加上我们兄弟二人都参加了革命（后来我弟弟十五岁时也参了军），所以对抗日和游击队的事特别热心。父亲有时也给探听和传递消息。工作人员到我们村大都吃住在我们家。我们家成了抗日军民的一个小联络站。一天黄昏，父亲从离据点二里地的一个村子跑回来，告诉我说，敌人的据点增兵了，要突袭游击队。我立即连夜去向游击队报告。路上，要经过坟地、山岗，因为白天下雨了，山路又窄又滑，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一路上不知摔了多少跤，心里只想赶快把信送到，让部队和群众做好准备，狠狠打日本鬼子。游击队接到通知后，很快转移、埋伏起来。第二天一早，汉奸领着五、六十个鬼子和伪军来了，没想到扑了个空，鬼子掉头往回返，刚走不远，我们的游击队发起了攻击，打得鬼子鬼哭狼嚎，连滚带爬地逃回去了。

这次战斗打死一个日本鬼子和几个伪军，还打伤好几个日伪军，缴获日军的一条三八大盖枪。这在当时，一个小小的游击队，取得这样的胜利，震动很大，大家高兴得不得了，极大地鼓舞了抗日军民的斗争热情。